

D U S H U W E N C O N G

王跃生

读书文丛

立足于现实的思考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53

W440

读 · 书 · 文 · 丛

立足于现实的思考

王跃生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QA746/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足于现实的思考/王跃生著. -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0. 3

(读书文丛)

ISBN 7-108-01344-4

I. 立…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773 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174,000 千字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7,000 册

ISBN 7-108-01344-4/F·90

定价 16.80 元

自序

收集在这本小册子中的主要是笔者近年来发表在《读书》等报刊杂志上的一些评论、随笔和读书笔记之类的文字。

这些文字在内容上比较零散,既包括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也涉及很多社会现象和思潮,但是无论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现象与思潮大都同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有关,是作者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对与经济转轨有关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变动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现象与思潮的观察思考。故此,名之为《社会、文化与经济转轨》。

90年代以来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中国社会“瞬间”超越了整个80年代,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着重新定位和适应环境的问题。但是,确定市场经济的方向不等于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对市场经济目标的选择可谓历尽

艰辛,而要完成这一转变则比确立市场经济的方向更困难、更复杂。过渡之“难”,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心理等等方面的原因,而且后者比之纯粹的经济过渡更复杂、更漫长。向市场经济过渡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之巨、之深,使每一个社会集团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能不也不得不关心这一过程,你不去关心它,它也要过来“关心”你。它会让你面对以前没听说过的物价上涨、下岗失业,市场疲软、商品过剩,会让你不得不接受以前认为“匪夷所思”的自费上学、自费出书。即使你的运气较好,有工作、有收入,也没碰上自费读书、自费看病、自费出版、自费分房等等这类“堵心”的事,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从社会的“中心”一下子滑到了“边缘”,不再能得到人们羡慕的眼神,受人尊敬的作家、教授、医生和大提琴手竟然变得不如商人、小老板甚至倒腾几双长筒丝袜或者萝卜、白菜的小贩;昨天的“领导阶级”今天甚至比不了刚刚进城的“农二哥”……这幅图景就是 90 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画卷。近几年读书界关于“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讨论、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的争辩,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和是否应该说“不”的争论,都反应了过渡社会的社会心理。我想,经济学家如果还在履行着自己的社

会责任,就有义务用自己比别人多懂一点的经济学知识对这种想象作出解释。经济学家应该研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纯粹理论和学术问题,研究过渡经济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同样也应该关心这种过渡的社会影响,因为经济学本身就负有“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双重责任。这本小册子中的一些文章,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问题”、“俄罗斯需要多少艺术家”、“域外看中国”、“也算一种声音——关于改革与一位俄罗斯学者的对话”、“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观点”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观点。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与同样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变化中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做了一些比较,我想,这是有益的。无论如何,这些以对话、问答、杂感形式写出的东西,也许可以避免专业性文章的刻板 and 枯燥,让非专业的读者也能了解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这或者也就是《读书》杂志以及《读书文丛》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下来历久不衰并获得越来越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是为序。

王跃生

1998年11月

目 录

1	自序
1	比较·借鉴·共存
15	也算一种声音
28	俄罗斯需要多少艺术家？
38	域外看中国——再谈市场经济与文化
50	苏联、东欧舆论谈经济的市场化转 变
62	俄罗斯放开物价为何收效甚微
72	东欧昭示我们什么
87	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出路

98	新制度经济学何以受到中国学者的 “宠爱”
109	文化传统与制度选择
120	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变迁
150	非正式约束经济市场化制度变迁
169	关于欧洲型经济体制及问题的思考
192	立足于现实的思考
204	经济改革中的产权、均衡和市场
218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问题
234	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观点
239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经济基础”
247	为什么会“过剩”
251	价格自律还是价格竞争
260	家庭责任制、农户行为与农业中的 环境问题
286	国有企业的效率、竞争与民营化
304	政治改革如何改善经济改革的绩效
316	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 的再讨论
339	环境污染：经济学的思考
352	社会价值、文明交往、民族主义

比较·借鉴·共存

1987年秋末冬初,在美国佛蒙特州的绿色山岗上一座住宅里,主人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同来访的苏联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梅尼希科夫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比肩长谈。两位经济学家的几次谈话,经记录、整理,编成了一本叫做《东西方对话》的小书。

两位学者同时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重新评价的时代”(第1页),或曰总结与反思的时代。自从本世纪初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苏俄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七十余年的路程。这期间,它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时期。六七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以其高速发展的勃勃生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经济的兴旺繁荣确乎吸引了那些后进的、步出封建形态后希望走一条非资本

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和国家。然而,近 20 年来,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问题逐渐积累、矛盾日益暴露。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地走上了经济改革之路。社会主义产生 70 余年来,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形成 40 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处于动荡与变革之中。

这绝不意味着否认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固有之优越性。这些成就和优越性被梅尼希科夫描述为经济的独立性、集中力量解决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社会的社会公正、平等、充分就业、低收入水平下的社会保障诸如免费医疗、教育等等,虽然不能认为这些措施的效果尽善尽美,但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连加尔布雷思也承认梅氏“对革命后社会主义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第 22 页)

从收入均等、社会公正、充分就业这些制度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必要的,又是很不够的,因为它们多少都同分配政策相关联,而马克思主义向来不同意把社会主义主要看成“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最

终是财富(生产资料)的分配,社会主义作为经济制度的基本优越性就在于它消除了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消除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异化,从而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率。如果对此没有令人信服の説明,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证就成了无源之水。可惜,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未能充分显示出它本应具有的优越性,它在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异化之后,又产生了“无人所有”的新的现象。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弊端集中表现在缺乏一种保证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机制,其根源则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所有制的三大观念系:所有制关系的简单化(公有制的惟一性)、公有制形式的国家化(公有制与国有制的等同)和管理权的行政化(把生产资料支配权混同于国家行政权)。正是这些观念使本应是普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了无主的、无人负责的所有制,也便消除了劳动者作为财产主人而工作可能带来的高效率。

从赫鲁晓夫算起,苏联的改革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了,这个时间不能说太短,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也都从 60 年代甚

至 50 年代初即开始进行改革。用今天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措施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集中管理方式和计划形式的改变以及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上,而忽视了最基本的所有制关系(财产关系)的调整。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触及到所有制问题。(回想一下卡德尔的《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这一名篇吧!)很可惜,南斯拉夫虽免于本末倒置,却又在此误入歧途:它用同样甚至更加理想主义的作为“非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代替了国家所有制,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那么,在“国家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之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应去向何方?梅尼希科夫多少提供了一些他个人的设想。他拒绝了加尔布雷思的“自由企业制度”即私人企业制度的建议,同时又提出借鉴西方国有企业形式的可行性。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关于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自主权相当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所享有的自主权。在西方,如在法国和英国这样一些国家,它们的某些经济部门实行了国有化,但是国营企业享有生产和商业独立性。我国企业的自主权可能相当于这些

部门”。(第 57 页)

一般地说,除了责任感、事业的成就感和劳动过程本身的愉悦之外,刺激劳动者努力工作的经济动因有两类,一是作为财产的主人出于对维护和增殖财产的关心形成的“财产制约机制”,一是与其劳动效率成正比的经济收入形成的“利益制约机制”。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不是财产主人,因而不可能具有财产制约,但由于充分发挥了利益制约机制的作用,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异化消除了财产制约机制的作用,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等又消除了利益制约机制的作用,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缺乏积极性、生产缺乏效率的主要体制原因。由此出发,社会主义的改革不能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新的异化(私有制下的异化)代替旧的异化(传统国有制下的异化),而要建立财产和利益双重制约机制。私人占有使劳动者注定不能像“为自己”那样劳动,它之所以必须努力工作是因为经济利益。而如果抛弃了对公有制的教条式理解,公有制并不是“命定地”不能建立起严格的利益制约机制(如今日盛行于社会主义各国的承包制、租赁制之类),同时又

增加了人们为自己工作而形成的财产制约。不能认为单重制约下所能达到的效率水平在社会主义双重制约下反而达不到。因此,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至少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经济效率,或者更高的效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尼希科夫对社会主义的自信是有理由的:“我看用不着回到资本主义那里去,如果社会主义能证明它更有优越性、更有活力的话”。(第 75 页)

加尔布雷思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的著名批评家。他对资产阶级政府某一时期的政策从不逢迎,总是待之以挑剔的批判态度。对于在西方世界风行了几十年的凯恩斯经济学,加氏也持一种相左的意见,以他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经济关系(或曰制度因素)著称,加尔布雷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态度和他对制度因素的独到见解,同样体现在本书中。

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加尔布雷思在谈话中对资本主义历史的总结。他说:“我国有那么一些自命为学者的人,他们认为纯粹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从 1776 年开始的,并把它同亚当·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们断言,从那时起,资本主义

就一成不变地存在下来了。但是,我却坚持认为,应该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处于不断变革过程中的制度”。(第 81 页)由于它在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变革,形成了他认为的“四个过程”。正是这四个过程,“保障了资本主义的未来”。

第一个过程是工会的发展。加尔布雷思认为工会“采取了一些新形式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实现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平等做了不少事”。(第 84 页)加尔布雷思说的第二个过程是产生了普遍的福利国家。他认为,“如果福利国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缺陷,那么资本主义就不会生存下去”。他并且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优点”。(第 85 页)第三个过程是本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它可以归结为,国家对生产的水平负责,其主要意图是用国家预算来补偿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任何不足。总需求一旦出现不足,国家就进行干预。国家采取减免税收或增加开支的办法,或者这两种方法兼而用之,以提高需求和生产,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第 87 页)至于第四个过程,则更洋溢着“加尔布雷思风格”,即“守旧的资本家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理阶层”。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加尔布雷思的宏论当然不能同意。实际上,这些过程并非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有些在马克思时代即已出现,只不过看法有异而已。今天,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日益陷入泥沼,凯恩斯主义也在长期滞涨面前一筹莫展,并出现了被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供应学派取代的迹象,至于权利转归经理阶层的理论,即使在加尔布雷思的故土也不是被普遍接受的。然而,尽管如此,这些过程使资本主义不断在局部克服若干自身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有作用的。

资本主义制度从变化中获得一定生命力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有所启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生产的物质条件在变,作为依据外部条件所做出之主观选择的经济制度(体制)也必然要变。历史和现代,以变化求生存求发展,墨守成规被淘汰的例子俯拾即是,这里也包含着“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意味。我们的东邻岛国日本,就充满着变革求生存的强烈冲动。远而观之,当“中央之国”时值汉唐盛世,日本人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科学、技术甚至文字、服饰、饮食;而当资本主义的曙光在大西洋两岸显现出勃勃生机之时,它又从西

洋吸收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再后，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出现以后，日本又成了资本主义中计划机制最为发达的国度之一。无论是来自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在那几个岛屿上一经消化、吸收、交融、改造，便成了“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地道的“日本造”。近而言之，日本从实业立国到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变化，也充满着变革求生存的思想。可是，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华夏民族，由于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从汉唐时代的开放、大度演变到晚清的封闭、保守，由于墨守成规不求变革而在世界竞争中落伍。我以为，小说家冯骥才的《神鞭》中那个“从弄辫子到使快枪”的“傻二”形象，其寓意是深刻的，对我们来讲，也多少有些苦涩的味道。

回到资本主义问题上。当今，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那么时兴了，资本主义又到了一个变革的十字路口。按照所谓“加尔布雷思改革”的思想，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不能靠回到凯恩斯以前的自由市场时代，而要靠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措施，即股东权的更大范围的分散、社会的中产阶级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策等。他说：“当代资本主义已经生产或能够生产足